

〔清〕 黄丕烈 著

尧圃藏书题识

宋明清小品文集辑注



0915602

44.6
HPL

〔清〕

黄丕烈 著

屠友祥 校注

尧圃藏书题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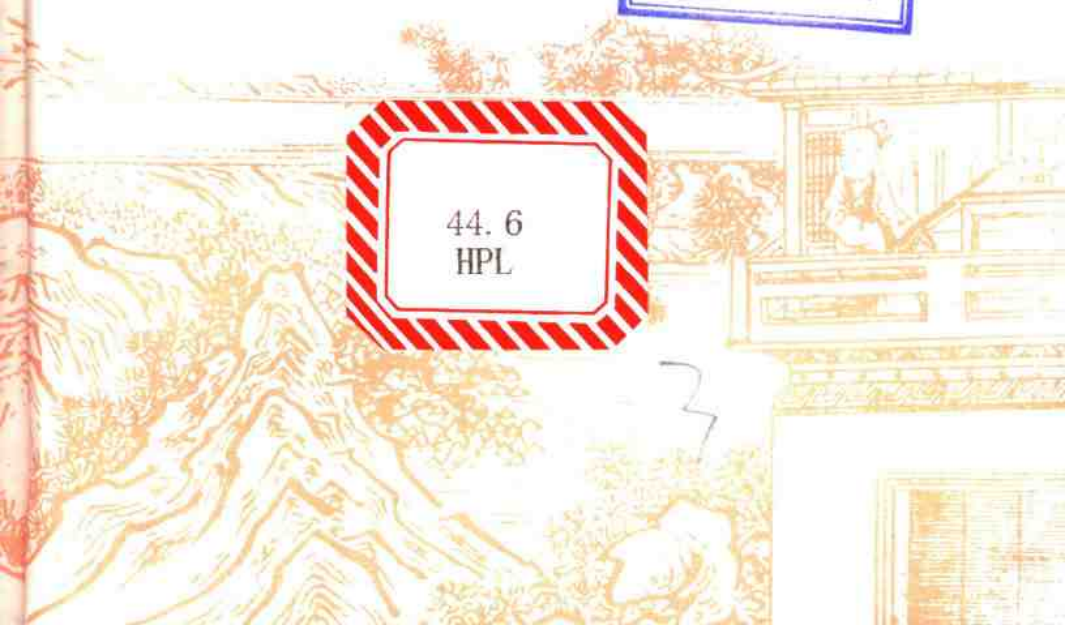
3

宋明清小品文集辑注

上海远东出版社



44.6
HPL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尧圃藏书题识/(清)黄丕烈著;屠友祥校注. 上海:
上海远东出版社,1999.8

(宋明清小品文集辑注)

ISBN 7-80613-645-2

Ⅰ.尧… Ⅱ.①黄… ②屠… Ⅲ.小品文 作品集
中国 清代 W.1264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42565 号

尧圃藏书题识

(清)黄丕烈 著

屠友祥 校注

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政编码 200231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35.5 插页 1 千字 816

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13-645-2/I·288 定价:38.00 元

宋明清小品文集辑注缘起

小

品之作，文辞简峭，然又随意写去，萧萧数笔，情致毕程。这般冲口信手的笔姿，宜于将片刻间的心意发露，其内涵包纳周遍，述学，谈艺，衡文，论道，酒蔬亭池，竹头木屑，无所不及，故不尽。不尽，遂不休无已，为祛此弊，故知止。知止则简，简则通道。——简，必有缺处，然彼有与此无触类相生，互为应答，显缺实则隐备。涉于繁，出以简，大抵是小品的本貌。至于文集的丛出，则始于宋。继之而发展，创出新句式来，便是晚明。至清，不衰。为使此类作品易于觅读，今取其五十种，汇为十辑，加以校注。注释殊非易事。清人阮葵生于《茶馀客话》述及此道，曰：注释者，诗文之冷锤也。假者于刀剑既成之后，细密加锤，曰冷锤。精铁得此，愈见坚利，毛铁则破碎。诗文注释，有意则精彩倍见，无意则罅漏多端。陈继儒则谓注书落剽窃则肤，落训诂则俗，复之有正笺，有旁书，不即不离，乍前乍却，颇似刘孝标注《世说》，陆农师注《埤雅》。两位所言，自是有味，令人欲依循一番，然而做起来总归是佳处难及，恶处不免。这套丛书，内中多有未经前人

注过者,倘有错失,惟望读者巨眼洞察,予以表出,方好。

编 者

一九九五年十月三日

莞圃藏书题识重编本序言

屠友祥

张宗子曾一再说，人无癖不可与交，以其无深情也；人无痴不可与交，以其无真气也。黄莞圃丕烈以佞宋癖名闻天下，自二十八岁开始收书，系以跋语，至六十三岁谢世，几乎无一日不专意于书。其题识若按日排比，则为一部藏书日记。王芑孙谓其积晦明风雨之勤，夺饮食男女之欲，以湛冥于其中，确为写实之笔。彼亦自谓半生历鹿，世事皆淡，无可表见于后，惟此几本破书，手为雠校，以为生平嗜好所在，不能释然。苦心购书，虽往后不无散佚，而流风馥韵，犹将留于后人齿颊间，较诸良田美产，转换他家，不复溯其主名者，不啻霄壤之别。然也时时有书为人播弄抑人为书播弄之叹，书可以解忧或反足以添忧之疑。嘉庆九年，莞圃长子玉堂亡，伯兄又去世，伦常间多不如意事，颇疑收藏古书，或为泄天地奇秘，遭造物之忌。而藉收书校书破寂，终依然如故。其题校元本《韩诗外传》十卷，道校书之乐，颇能见其心境，云：今日寂静无事，于午后连校三卷。昔也是翁云，闲窗静坐，炉香郁然，览兹墨妙，是正书中一二讹字，觉人世间荣名利养之乐罕有逾于此者。余亦以为然。嘉庆六年，莞圃曾由举人挑一等，任以

知县，不就。后得虞山毛氏藏北宋本陶诗，又得南宋本汤氏注陶诗，遂颜其居为陶陶室。大抵用以自寓。盖辞县令归家，形迹与陶有相仿佛处。堯圃得《石屏诗集》，七言律中，有《访赵升卿诗》一首，内第五六句道：田园自乐陶元亮，乡里多称马少游。为之拍案，以为发其晨钟之觉。虽后来处境愈益贫居贱，犹毫无悔意，以为倘不如此，恐此身与家非自己所能拥有，仍以石屏诗句自揭道：一官不幸有奇祸，万事但求无愧心。可为与不可为，纯以适意和避祸两者兼备为枢要，见出耽意于藏书不是个单一的举动。且收藏与易出交替而行，取善本精校刊刻，以广流布，同时亦为易书之资，晚年更开滂喜园书籍铺鬻书，则其藏书之举将意趣所归与存身所系全然化合了。即在这聚聚散散之间，堯圃精力所萃，老眼所注，滢留于题识中了，一一宣发古书的佳处，黄跋遂为众人所宝重，并以商品价值形态表现出来，张钧衡《适园藏书志》书钞阁行篋书目附严铁桥文道：复翁收百宋一廬诸刻本，售与山塘益美布商汪闾源，虽残帙数十叶，亦有至数十金者。闾源购书有复翁跋，虽一行数字，必重价获之。以故吴中书贾，于旧刻旧钞，虽仅有一二卷，倘有复翁藏印，增价必倍。若题识数行，价辄至十数金矣。即至残破签题，毁损跋语，亦可单售一二金，至今犹然。这其实是对他鉴定版本的独到日光的信任。

堯圃收书有一过程，初先遇旧刻即收，其实不知此书之有用与否，而后专讲宋元旧刻，以及名人手录，或精校本，几置明刻不论。跋语中屡屡言及将欲辑或正在辑《所见古书录》，把平生所藏所见，列为五类，一宋刻，二元槧，三毛钞，四旧钞，五杂旧刻。书所以贵宋刻，并非因为它无一讹误，而是一二误处，尚可循形与声而得其本字，舛讹出于无心。无心之误，读者自知。后世刻本则依文从字顺之法径改了，为有意删削，遂消弭了原本可得的样貌，使得读者无从推知。堯圃佞宋，即取其未经后人校改这一层。

盖书经校勘，已失真面。如何义门校旧钞本《虞史》，应属闻人动笔，然尧圃亦举其一失，卷中集贤张君房一条，“儆戒会最五十事”，“最”意为“聚”、“要”，原本不误，而义门将“最”校作“蕞”，则大可不必，虽然“蕞”除状“小”貌外，也含“聚”义。且会最已成一辞，尧圃所举惠松崖《汉事会最》书即为一例。故校书不可不慎。就义门校旧钞本《张来仪文集》，尧圃又摘出一字——幌，《广雅》注为“读书床”，而义门疑幌为幌，且已校木旁为巾旁，亏得后文又出现幌字，方悟幌字不误，改回，又举《广雅》注相证。尧圃自悬一个衡准，凡古书非的见旧本，不可擅改。因为传录总会有误。若无旧刻最先之本，须兼收并蓄，多备复本，以作参校，方得其是处。《砚笈》四卷旧钞本，陆东萝搜诸冷摊而赠与尧圃，取与陈仲鱼钞诸友人之本相对勘，内吴淑《砚赋》“成墨海于一细”，两本俱作“细”，按之文义，殊为不通。取阅影宋钞本《事类赋》，则作“纽”字，注引《文房四谱》道：昔黄帝得玉一纽，治为墨海焉。“细”为形似而误。后又与试饮堂顾氏藏旧钞本校，知两本卷二中俱脱第十三叶。其中陈本和顾本行款同，而陆本改易了行款，已泯灭了阙失的痕迹，若不是经多本相勘，这一叶也就这样湮没了。可见闻见不可不广，书多一本，即有一本的佳妙处，有一本的不同处。然而事情往往是见及数本，无法决断，——倘若天壤间尚有宋版在，以折衷其是非，岂不更快乎。这类心存大的期盼的浩叹，题识中屡有所遇。尧圃自命其居为读未见书斋，以得读奇秘之本为大欢喜，且得陇望蜀，悬至善之本于想望之中。钱牧斋从绛云徐楚乱帙中检出钱叔宝钞本《道德真经指归》残本，于除夕夜派专人驰去，嘱钱遵王遣人将此缮写成善本，再与道藏本参订一下，看异同如何。——“此夕将此残书商榷，良可一胡卢也。”牧斋自身也不禁莞颐。而尧圃誉之为“是真能知书者”，因为书本子一本有一本的面目，倘若不得真本，即使尽美了，也不可

谓之尽善。也由于堯圃这样的读未见书的不知餍足的渴望，许多残本就这样配齐了。蓄重出之本及不全之本，为堯圃独到的藏书之道。重出者，取为雠勘之具。不全者，或为残缺之补。即如旧钞本《庆湖遗老诗集》，陈仲鱼自书坊获前半部，因堯圃家多重出之本，或可补全，遂相赠。恰好张纫庵受启于堯圃竹头木屑亦兼收并蓄之说，也开始收残编断简，出手即得诗集的后半部，两者合若延津之剑。应了竹头木屑预储需用之言。这样对片纸只字也予以收藏，堯圃素朴地辩称为出于惜字的考虑，不是为了好奇。以为古人慧命全在文字，如遇不全本而弃之，从此便没有完整之日了，因而对残缺者尤为加意，尝自号为抱守老人。这种观念跟大多数藏书家的想法是不大一样的，一般总是唯足本是尚，如张之洞即以为：“善本”非纸白版新之谓，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，精校细勘，不讹不缺之本也。“善本”之义有三，一曰“足本”（无缺卷，未删削），二曰“精本”（精校精注），三曰“旧本”（旧刻旧钞）。足本为善本的首要条件。而黄堯圃注重的不在全不全，在是不是真本。旧钞节录本《芦浦笔记》，初先书友携来，堯圃见其装潢狭小，殊不耐观，便还给了对方，不免犯了鉴赏家的通病。后张纫庵谈及此本有一二佳处殊胜鲍刻知不足斋丛书本，遂取回，与穴研斋钞本相勘，凡胜处悉合，较鲍刻十卷足本为优，因而可断定此旧钞本所源出者为真本。韦庄《浣花集》，堯圃以往藏有三本，一为黑格精钞本，一为蓝格旧钞本，一为毛氏影钞宋本。三者之中，影钞为上。后陆东萝从冷摊得一残宋刻本，持赠堯圃，用以取对，则残宋刻又在影钞之上。衡量的准绳即在于是否具有真本面目。毛氏影钞之善，向为众人所公认，而犹逊于古刻，原因还是在于古刻一字一句之误，尚可谛视版刻，审其误之所由来。堯圃藏有毛钞影宋本《棠湖诗稿》，钱唐何梦华拿着朋友所藏的宋刻《棠湖宫词》来，上有“宋本”“甲”两图记，另外也都是子晋的名

号章，没有他人的印记，可证属汲古阁所藏，毛氏影钞源出此刻。刻本首标“棠湖诗稿”四字，下有墨钉，版心只是“棠湖一”“棠湖二”之类，不标“宫词”字样，堯圃以为或是当日众宋刻中的一种，所以不标。第三十末句“捷书清曙人行宫”的曙字阙笔，第三十八首句“外庭公事近今稀”的今字误作金。而毛钞版心添入了“宫词”字样，曙不阙笔，金字径改为今，俱非旧貌了。精善如毛钞，一经影写，已多歧异，遑论其他。以此，堯圃自然异常地珍视宋本，残帙亦宝爱之至，以为残缺无伤其为古物，为真本，况且天下佳物，被目为珍秘，原不必待完善了方才如此。就后人嗜古而欲求全的心情，堯圃的反问让人有会心之契，他说：“开蒙读《大学》，亦知有亡篇乎？何不害为万古经书也？”（题残宋本《后村诗集》）

宋刻讹少，舛误易看出，决定了它的功用为正讹，定是非。世无宋刻，则旧钞为贵，出自名家所藏，尤为贵。旧钞《李群玉集》，堯圃藏有三本，一叶氏钞本，一冯氏钞本，一毛氏钞本。在未见宋刻的情况下，就此三本相核，缺处惟冯本独全，似以其为较胜。后得宋刻，取与诸家钞本相勘，始知叶本行款与宋刻合，上中下三卷目录及卷中诗大段相近。而《后集》五卷，宋刻无目录，诸本倒都有，堯圃遂以宋本之缺为憾。及取叶本相校，则远远比不上宋刻。卷中之诗既不可信，目录也就愈益不可信了，还不如宋刻无目录，倒不至于歪曲了真实。冯毛两本似出一源，然而《后集》之诗又似与宋刻近，与叶本异，且冯毛两本目录亦与叶本异。倘若不见宋刻，则诸本各为异同，无可适从。堯圃佞宋的根本缘由也就在这里，是将宋刻作为依据和指南来看待。宋时刻书之先，严加雠勘，据江少虞《事实类苑》记载，宋初官刻书，一书校勘既毕，送覆勘官，覆勘既毕，送主判管阁官，覆加点校，凡历三道手续。治平之前，校刻之事，均由国子监掌管，不得擅自镌版。熙宁之后，此禁方开。宋人周密《癸辛杂识》评杭州廖氏刊本道：“廖群玉

诸书，《九经》本最佳，凡以数十种比较，百余人校正而后成。以抚州草草纸油烟墨印造，其装褫至以泥金为签。”宋人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评宋刻道：“今天下印书，以杭州为上，蜀次之，福建最下。京师比岁印板，殆不减杭州，而纸不佳。蜀与福建，多以柔木为之，取其易成而速售，故不能工。福建本遍天下，正以其易成故也。”书籍制作，必有一时代的样貌，后人据这些样貌来判别是否为真本。依此，则不得不讨究宋刻的面目。于黄尧圃之前，已有多人论及这点了。明张应文《清秘藏》卷上论宋刻书册条云：“藏书者贵宋刻，大都书写肥瘦有则，佳者绝有欧柳笔法，纸质匀洁，墨色清纯，为可爱耳。若夫格用单边，间多讳字，虽辨证之一端，然非考据要诀也。余向见元美家班、范二书，乃真宗朝刻之秘阁，特赐两府者，无论墨光焕发，纸质坚韧，每本用澄心堂纸为副，尤为精绝。”论面目固难免出之以鉴赏家的眼光，张之洞说善本非纸白板新之谓，即是针对张以文面言的，张以文列评书次第道：“纸白板新，绵纸为佳。活衬竹纸次之。糊梢批点者，不蓄可也。”明谢肇淛《五杂俎》谓：“凡宋刻有肥瘦两种，肥者学颜，瘦者学欧。行款疏密，任意不一，而字势皆生动。笺古色而极薄，不蛀。”明高濂《遵生八笺》论藏书云：“宋人之书，纸坚刻软，字画如写。格用单边，间多讳字。用墨稀薄，虽着水湿，燥无湮迹。开卷一种书香，自生异味。……宋本书刻，以活衬竹纸为佳。而蚕茧纸、鹤白纸、藤纸固美，而存遗不广。”黄尧圃题校宋本《姚少监文集》也转录明人叶盛《水东日记》道：“宋时所刻书，其匡廓中摺行上下不留墨牌，首则刻工私记本板字数，次书名，次卷第数目，其末刻工姓名以及字总数。余所见当时印本如此。浦宗源家有司马公《传家集》，行款皆然。又洁白厚纸所印，乃知古于书籍不惟雕镌不苟，虽摹印亦不苟也。”又转录明张大复《梅花草堂笔谈》道：“有传视宋刻者，其文钩画如绣，手摸之，若洼隆然。”刊入士礼居

丛书的清人孙从添的《藏书纪要》道：“鉴别宋刻本，须看纸色，罗纹，墨气，字划，行款，忌讳字，单边，末后卷数不刻，末行随文隔行刻，又须将真本对勘，乃定。……若果南北宋刻本，纸质罗纹不同。字画刻手古劲而雅，墨气香淡，纸色苍润，展卷便有惊人之处，所谓墨香纸润，秀雅古劲，宋刻之妙尽之矣。”晁圃也在题识中随处提到了宋刻的种种面目特征。从这些话中抽析归结一下，不外是版式、行款、字体、墨色、纸色、书牌木记、讳字、刻工、藏书印记诸类。

两宋绵延三百一十馀年，所刻书的版式自然不会一成不变。初期大抵是细白口，单边。后期为左右双边，或有四围双边的，但不多。细黑口南宋时出现。晁圃且指出宋刻也有阔黑口的，遇见这种版式，即使如晁圃那样的老眼，骤视之下，也不免疑为非宋刻。宋本《新定续志》板口即为阔而黑者，拿去给卖书人钱听默及藏书家周香严看，两位经眼古书不知凡几，都不敢确定是不是宋刻，只是诧异为未见书。惟晁圃与顾千里断为宋刻，且想及所藏《中兴馆阁录续录》有南宋咸淳时的补版，纸墨款式皆与此相类，间或也有阔黑口的，可知宋刻书未必都是白口或细黑口。此际晁圃三十九岁，收书已有十馀年的历史了。可到了五十九岁那年，为张英川题《九灵山房集》等三种，缴还，并附手札云：“兹又寄到《国语》，此实明刻，非南宋本也，宋本从无阔黑口者。”所下断语，确定不可易。前后睽违，不知为何。就行款而言，宋刻每行字数往往不划一，本书附录所载《百宋一廛赋注》多有每行几何字不等之类的字样，即是道说这种情景。各本行字疏密也各有面目，宋蜀大字本《三苏先生文粹》七十卷末，有李兆洛跋语，谓“此书宋刊密字本绝精美，此本疏朗，乃宋刊之别体”。江标撰有《宋元行格表》二卷，言行款至细，大可参考。总之，疏密有时相差颇为悬殊，如宝祐五年陈兰森所刻《干禄字书》，每半叶仅四行，行八

字。而南宋刻《九经》白文，密至每半叶二十行，行二十七八字至三十字不等。宋刻字体，往往横轻直重，即谢肇淛所谓肥者学颜，瘦者学欧。字画凝重斩方，端严古劲，然又具生动之势。黄尧圃题校宋本《礼记郑注》二十卷，谓曾从东城顾氏借得残宋本《礼记郑注》，“字画整齐，楮墨精雅”。题宋刻本《史载之方》二卷云：“字画斩方，神气肃穆。”题残宋刻本《图画见闻志》六卷，谓周香严初得此本，亦认为宋版，继而见其“字画方板”，疑为翻本。尧圃携归与前所收翻宋本对勘，行款虽同，而楮墨俱饶古气。细辨字画，遇宋讳皆缺笔，若是翻本，毋需如此。于是再揭去旧时背纸，见原楮皆罗纹阔帘而横印，为典型的宋刻之纸，始信是宋刻宋印。又以翻本行款相证，断定这就是所谓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行本，此铺在棚北大街睦亲坊南，所刊遂名书棚本。尧圃又证之以以往所藏的南宋书棚本，如许丁卯、罗昭谏唐人诸集，也都是这样“字画方板”。张元济甚至有“审别宋版，只看刀法”之说。宋刻书用墨之佳，孙从添说是墨气香淡。这与宋时物力之盛有关，且文人学士悉心考校墨法，良工辈有传人，一时风习所尚，妙墨大出。本丛书首辑《东坡题跋》内苏轼所述，可谓有趣致的实录。至明万历之后，方用墨煤和以面粉胶水，取代墨汁，开卷秽浊，了无墨香。用煤面为料，这在万历刻本《南京礼部编定印藏经号簿》可以见到明确的说法：“作料：烟煤五篓，银壹两。面伍佰斤，银叁两。”宋纸白而硬，正反面皆有光泽，可以两用，所以宋版书时有以官府文牒翻其背面印者，尧圃跋《北山小集》四十卷，云：“书友胡益谦持《北山小集》示余，欲一决其宋本与否。余开卷，指示书背曰，此书宋刻宋印。子不知宋本，独不见其书为宋时册子乎？”《百宋一廬书录》云：“此程俱致道所撰《北山小集》四十卷，宋刻宋印，即其纸背之字，已可征信。余尝持示钱少詹辛楣先生，先生云，古人公移案牍所用纸，皆精好，事后尚可它用，苏子美监进奏院，以鬻故

纸公钱祀神宴客得罪。可见宋时故纸未尝轻弃。”题宋本《芦川词》二卷云：“宋本书纸背多字迹，盖宋时废纸亦贵也。此册末刻固不待言，而纸背皆宋时册籍朱墨之字，古拙可爱，并间有残印记文，惜已装成，莫可辨认。”又题影宋本《芦川词》二卷补录此记文云：“宋刻本《芦川词》……用废纸刷印，审是册籍，偶阅之，知是宋时收粮案，故有更几石、需几石，下注秀才、进士、官户等字，又有县丞、提举、乡司等字，户籍官衔，略可考见。梗槩省文，皆从便易。虽无关典实，聊记于此，以见宋刻宋印古书源流，多有如是者。”茆圃题宋刻《图画见闻志》谓罗纹阔帘而横印，亦是辨宋纸的一法。叶盛《水东日记》谓宋时所刻书，其匡廓中摺行上下不留墨牌。然而私刻坊刻，于书之首尾或序后目录后多有牌记，外围有墨阑环绕，因而也叫墨围。又称碑牌，由于外形像碑之故。与现代书籍的版权页相类，且兼具广告的作用。如茆圃题校宋旧钞本《东莱先生诗律武库》三十卷，谓用以取校这旧钞的宋刻，前后二集，各十五卷，其前集碑牌四行，道：今得吕氏家塾手校《武库》一帙，用是为诗战之具，固可以扫千军而降勍敌。不欲秘藏，刻梓以淑诸天下收书君子。伏幸详鉴。谨咨。也有但记刻书年月及刻者姓名的，《百宋一廬书录》载蔡琪刻十六行十六字本《后汉书》，目录后有碑牌一，其文云：嘉定戊辰季春既望蔡琪纯父谨咨。碑牌往往是鉴别版本的直接依据，亦为较易作伪的地方。宋刻书的另一显著特征，便是避讳极严，官刻尤为如此。就一般的避讳惯例，程大昌《演繁露》道：“本朝著令，则分名讳为二：正对时君之名，则命为御名；若先朝帝名，即改名为讳，是为庙讳。”宋时庙讳之多，前所未有，洪迈《容斋三笔》说：“本朝尚文之习大盛，故吏官讨论，每欲其多，庙讳遂有五十多字者。举场试卷，小涉疑似，士人辄不敢用，一或犯之，往往暗行黜落。方州科举尤盛。此风殆不可革。”然而这也为辨别版本的时代提供了明显的

依据,陈垣《史讳举例》谓避讳“其流弊足以混淆古文书,然反而利用之,则可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,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,识者便焉”,即道此情景。书友起先拿来《诗律武库》旧刻本,莒圃断为元刻。后取校旧钞本,见卷中遇朗敦亘等讳,间或避之,乃知是宋刻,不是元刻。莒圃就刻本中碰到的两类状况,皆断为宋刊。一是严到连嫌讳都避,题校宋本《礼记郑注》二十卷,谓借得残宋本《礼记郑注》,取与校宋本对勘,则残宋本避讳较多,如县畜竖萑莞等字,皆宋嫌讳而犹避之,莒圃断定此必宋本中之善者。一是所避不全不广,宋刻本《浣花集》卷中避微禎玄树四字之讳,而玄树有不尽避者。见者或疑此非宋本。而莒圃以为“宋版时或有此”。题宋本《嘉祐集》十五卷,亦谓其“遇宋讳,皆以朱笔圈其字,亦足见板刻之前,故所避不广,皮相者以为大疵,非真知宋本之妙者”。这两类莒圃或视为“善”者,或认为刻本在时间上较“前”,都为佳胜的标志。然陆心源跋宋槧宋印《韩昌黎集》谓莒圃误断绍兴刊本为北宋本,《昌黎先生集》十三卷……即《百宋一廛赋》之小字本。今考……凡高宗御嫌名,皆为字不成。……惟慎字不缺,当为绍兴中刊,非北宋本也,莒圃误矣。莒圃还据刻工名姓来判别是否宋版,因为若是刻字良工,或是此本已定为宋刻,此本上所具的刻工,在彼本出现,则也可作为判别的一个依据。如残宋大字本《礼记郑氏注》,板心有刻工姚臻、毛谅、徐高等姓名,莒圃便断其为南渡前精刻本。宋本《伤寒要旨》二卷及《洪氏集验方》五卷,刊刻之地俱为姑孰,刊刻之年同为乾道,一庚寅,一辛卯,仅前后年之差。而刻手又同为黄宪、毛用两人,莒圃在其他宋本书跋中亦屡屡提及这两位。若是刻工生活时代适处鼎革之际,则不能光凭其为何朝人来定版本年代,如元初刻本风貌与南宋后期无甚差异,也有刻工相同的缘故。另外原版修版刻工也有差别。间接地确定宋本的依据还有藏书印章。莒圃于古书的授受源流至为关心,就收藏之人物或处所,可考者大抵都

在题识内加以著录，其题《宋刻颜氏家训》七卷，谓书分三册，于每册卷首及尾，皆有“省斋”、“共山书院”二藏书印章，虽省斋不知何人，而共山书院则属元代。钱大昕撰《补元史艺文志》，载有《共山书院藏书目录》，可知此即其所藏之书。每册首尾纸背有长方铃记，其文云：国子监崇文阁官书，借读者必须爱护。损坏阙失，典掌者不许收受。堯圃以何小山校本《经典释文》于《左氏春秋音义》末卷所摹之印相证，悉悉相合。何识云：印长二指四寸五分，阔不一指一寸六分。而纸背印记何义门没有表出。堯圃拿去给钱大昕看，钱氏以为这是淳熙台州公库本，卷中于“构”注“太上御名”而阙其文，因为彼时光尧尚在德寿宫。前序末有长记“廉台田家印”五字。考元制，各道置廉访使，为行台所属。廉台之名，实始于此。钱氏以为此本大抵是宋槧而元印。其他宋本有官书印记者，堯圃所见宋本唐人文集，如孟浩然集、刘宾客集、刘随州集、姚少监集之类，都有翰林国史院官书朱印。瞿木夫以为是元时印。堯圃每收一书，都寻阅藏书印记，对毛子晋、钱遵王等人印记，尤加珍视。藏书家印记或铃名印，或署斋号。惟汲古阁毛氏于宋元刊本之精者，则以“宋本”“元本”椭圆印别之，又以“甲”字印铃于首。宋本《咸淳临安志》九十三卷，内纸有黄白两种，为宋刻，惟一卷、八十一卷至八十九卷为钞。书中黄纸上均有“高平家藏”一大印，“朝列大夫之章”“国朝三代簪纓”二小印。白纸自卷七十五至八十，首末皆有汲古毛氏印。就此，堯圃的议论是：古籍流传原委有自，洵可宝也。这一点是堯圃所寻求的，于题识内时时可以见及。关于宋刻，堯圃还就闻见所及，指出如高注《战国策》、欧阳忞《舆地广记》、刘向《古列女传》《新序》之类，同一宋本，而皆有异。堯圃取各存其真的态度。《唐女郎鱼玄机诗》一卷，堯圃取与洪迈《唐人绝句》、韦穀《才调集》相证，题句亦互异。三者皆宋本，而不同如此，可知宋时亦非一本，无法执而同之。又，

宋刻本一经翻雕，神气便失，不必待到异代方是如此。如宋本《新序》，堯圃从东城蒋氏借归，同自己所藏者相校，虽行款悉同，而字形活变，不能斩方。且错误叠出，遇宋讳皆未缺笔，每叶上填大小字数，下注刻工姓名，皆与黄本异。盖书经重修，自不能无误，虽宋槧亦已如此。再是俱为宋本，而中实有不及元明刊本者。堯圃以为是所从出之本不同的缘故。如《后汉书》元正统本最善，因为出自淳化本的缘故，而淳化本已不可得见。元大德本亦从淳化本出。而宋建安刘元起刊于家塾敬室本、蔡琪一经堂本则远不逮正统本。题元本《东坡乐府》二卷，述顾千里言，亦谓元延祐庚申叶曾南阜书堂刻本《东坡乐府》胜于宋绍兴辛未曾慥刻本。

堯圃屡言元本不可轻弃，固有其理由。元初刻书，与宋治平以前必须申请国子监相类，亦需中书省审读。明陆容《菽园杂记》云：“元人刻书，必经中书省看过，下所司，乃许刻印。”《天禄琳琅书目》云：“元人刻书，并有中书省牒下诸路刊行。”元刻《资治通鉴》王磐序云：“京师创立兴文署，署置令丞，并校理四员，咸给廩禄，召工刻刻诸经子史板，布天下，以《资治通鉴》为起端之首。”地方刻书，由书院及各路儒学主其事。书院学田所入，供饬廩外，余资使用以刻书。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卷十八谓书院刻书具三善，最主要的是山长无所事，而勤于校讎。另外资多工精，板不储官，易印行，倒还在其次。元刻面目较为单纯，多黑口，无讳，时有简体俗体字，而其字形多为赵松雪体，颇引人醒目。如堯圃所藏元本《稼轩长短句》十二卷，“纯乎元人松雪翁书”。然而这一风习也渗透到了明初的刻本，徐康《前尘梦影录》谓：“至明初，吴中四杰高扬徐李，尚沿其法。即刊板所见，如《茅山志》《周府袖珍方》，皆狭行细字，宛然元刻，字体仍作赵体。”这就需审慎明辨了。及嘉靖时，白口方字仿宋的刊刻风格形成。

明刻自万历始，率意删改旧籍，舍弃古式，常遭后人诟议。顾